

书中认识李光耀

本报记者 吉祥

从1959年到1990年，李光耀担任了31年的总理，这段时间，他是领导新加坡前进的“李总理”。卸任后，他留在内阁，从1990年到2011年的21年间，变为“李资政”的他依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

在他的强势领导下，弹丸小岛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艳羡，但威权领导风格又为他带来争议。尽管李光耀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但在其生前身后依然有多本书籍总结他的治国理念，而“新加坡模式”也总能引起人们诸多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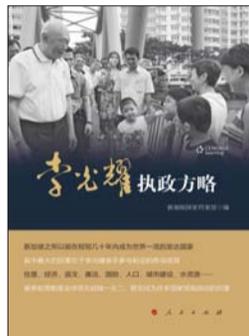
2013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出版《新加坡选择了李光耀》丛书，系统总结“国父”李光耀的建国思想、治国方略、外交思维和修身齐家的心得。今年3月，人民出版社将该丛书分为3册引进，第一册《李光耀执政方略》已经出版。作为一位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国内此前出版了多部与李光耀有关的传记、回忆录。2013年11月，《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由译林出版社在国内发行，这本书充分体现了李光耀的治国理念：精英主义、贤能制度、实用主义与亚洲价值。比如，李光耀认为政府必须由国家的精英来领导，治国者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去年，作家凌翔的《李光耀传》正

式出版，这也是目前国内第一本李光耀传记。

2009年，普利策奖得主汤姆·普雷特对李光耀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独家访谈，2011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李光耀对话录：新加坡建国之路》再现了这段访谈内容，在这本书中，李光耀除了阐述他的种种治国理念，也对一些外界的批评做了幽默的回应。作为一位与中国多位领导人保持良好互动的外国政要，李光耀被认为是一位“知华派”，2013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这本书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序，在该书中，李光耀就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未来的国际关系走向做了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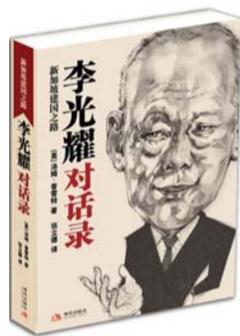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 口述
中信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李光耀执政方略》
新加坡国家档案 编
人民出版社
2015年3月出版



《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年11月出版



《李光耀对话录》
汤姆·普雷特 著
现代出版社
2011年3月出版

作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强人，外界对李光耀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李光耀谈论了众多与其相关的问题。

比如，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了他？日本侵略又是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他为什么拒绝建设高福利社会？他又如何为他在新加坡实行威权统治，未经审判关押一些人，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辩护？本报经中信出版社授权，摘录该书中部分内容，呈现李光耀的自述——

李光耀：从来没有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

“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我是名副其实的实用主义者，因为我不愿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

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在1942年发动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再持续1000年。我从未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先是英国人在这里，他们是固有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人，之后日本人来了，我们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视和斜眼。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

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

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

“以财产和地位为基础的特权社会必须让位给以个人能力和社会贡献为基础的社会”

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

以财产和地位为基础的特权社会必须让位给以个人能力和社会贡献为基础的社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只有鼓励人们做出最大

贡献，社会才能实现进步。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如果实施了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么那些懒散、无能的人得到的就会和勤奋、杰出的人得到的一样多，最终会打击后者的积极性，他们会竭力减少付出。然而，我们虽然无法创造一个回报均等的社会，却有可能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回报多少不是由社会成员占据的财产多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换句话说，社会应该鼓励人们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回报。

我不明白对人民爱护有加对一个民族的进取心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这只会降低人们取得成就、实现成功的愿望。

我们需要的东西可以这样表述。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社会。你的人民不能浑浑噩噩地奋斗，必须有明确的改善境遇的欲望……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保留多种族、多语种、多文化、多宗教社会的活力。在英语成为全世界和互联网通用语言的时代，我们的优势之一就是全体新加坡人都接受过英语教育。然而，我们一定不能丢掉我们的基本优势，那就是我们的原有文化和语言带来的活力……现实与务实的心态对于克服新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改变，这些正确的东西就包括诚信与正直、多元种族、机会均

等、精英管理制度、让回报与社会贡献成正比、要避免“自助餐综合症”，即付款之后尽可能地多拿多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福利和补助才挫伤了人们力争上游、实现成功的动力。

“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了……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正常运转……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论定，到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邓小平如何评说新加坡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光耀与中国多位领导人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当被问及最崇拜的领导人时，李光耀便说了邓小平，“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记录了邓小平1978年11月出访新加坡的经历，根据该书记载，邓小平对新加坡的变化印象深刻，“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回国后的一次有关利用外资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了新加坡的做法。“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新加坡扮演了一个榜样的角色，大批中国官员陆续到新加坡学习。《邓小平时代》写道：“邓小平觉得，新加坡是个令人向往的改革榜样，他准备派人去那里学习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控制腐败的经验。”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的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一次提到了新加坡。彼时，诸如经济犯罪、吸毒、嫖娼等犯罪活动在南部沿海城市出现，邓小平在谈话中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